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任智勇
戴圆
编

郑观应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任智勇
戴圆
编

郑观应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郑观应卷/任智勇, 戴圆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300-20041-5

I. ①中… II. ①任… ②戴…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郑观应 (1842~1921)-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5705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郑观应卷
任智勇 戴圆 编
Zheng Guanying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刷 印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23.7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61 000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 17 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 19 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 1840 年到 1949 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郑观应（1842年7月24日—1921年6月14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雍陌乡。本名官应^①，又名观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等，中年后别名罗浮待鹤山人。作为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在近代思想史和经济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代开始，就陆续有学者对他展开研究，如邵循正等著名历史学家就曾对他进行了专题讨论。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夏东元适逢其时地在洋务运动的研究脉络中对郑观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了《郑观应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以及在《郑观应传》基础上补充修订成的《郑观应》（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书中所言一时成为不易之论。而其学生易惠莉也出版了《郑观应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直接以郑观应为主题的研究论文更是达到了300篇以上。这些多少可以表明郑观应在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而郑观应的名著《盛世危言》更是不仅在清代就被多次盗版翻刻，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还至少有九个出版社出版过《盛世危言》。^②此次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之邀，我在此再次选编郑观应文集。

时与势移，当我们在21世纪重新审视郑观应时，我们对“泰西”已经不再陌生，对发展经济已经不再那样焦急渴望，对促进政治革新的

① 关于郑观应的本名，除了夏东元外，大多数学者都以“郑观应”为其本名，其实这是他的俗名，他的官方和家族称呼都是“郑官应”，只是现在“积俗难返”。参见邓景滨：《郑观应考证两则》，载《岭南文史》，1994（2）。

② 按照费成康先生的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1年，先后有上海人民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蓝天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等七个出版社先后出版过《盛世危言》。就编者所见，此后还有2002年辛俊玲评注的华夏出版社版、2006年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版。此外，海峡对岸的台湾也至少有1968年大通书局版和1976年学生书局版这两个版本。

种种举措也早已耳闻目睹。我们这个时代已然不再需要对郑观应等当年了解西洋的人进行顶礼膜拜——虽然他们的忧国忧民情怀依然值得尊敬。在今天的我们眼中，郑观应已经褪去光环，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不再需要为他文过饰非，只需要还原一个历史中的人物。

作为选集，总需要对原著者的生平做一个介绍，以便读者了解原著者，了解文字背后的他的故事。鉴于夏东元诸位先生已然有了非常详尽的传记，所以在这里，仅就自己所理解的郑观应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郑观应和他的时代

现在研究人物的学者都非常清楚一点：历史人物不能离开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即使英雄人物也是如此。郑观应无法比英雄更高一筹，所以我们只能把他放在历史的情境之中去理解，所以对郑观应的介绍的第一部分就是他和他的时代。

在阅读关于郑观应的史料的过程中，我个人以为他的出身和他的交际圈对他人生的轨迹影响莫大，下文也就分成两个部分进行介绍。

1. 出身

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使得郑观应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有了特殊的际遇，他的人生轨迹和人际交往也大抵与此有关。

他的父亲郑文瑞很可能在咸丰初年（19世纪50年代初）曾在上海做过买办，不久后回到故乡担任塾师。这样的经历，使得他并不排斥经商，而他的孩子们在科举未成之后也相继被他送到上海学做买办。郑文瑞“既商亦儒的人生道路影响了郑观应的人生经历”^①。

1858年，当郑观应十七岁应童子试未成时，他没有和岭南等地众多的士子们一样选择再考，而是去了上海投奔叔父准备去洋行当买办。因为，当时在上海的诸多为外商服务的中国人都是开埠后从广东跟随而去的广东人。而且“出于对广东买办特别是香山买办的信任，开埠初期的上海外国商行，大都愿意雇佣香山人做买办”^②。郑氏家族的诸多亲友更是为郑观应铺垫了前途。

可能是因为前途只有成为买办一条，郑观应别无选择，只有努力学

① 易惠莉：《郑观应与他的家族》，载《岭南文史》，2002（3）。

② 胡波：《香山买办与开埠后的上海社会》，载《史林》，2004（4）。

习英语，努力学习经商手段，积累经商经验。到了1859年，在同乡亲友（曾寄圃和徐润，他们都是宝顺洋行的买办）的帮助下他转入宝顺洋行工作，并于次年成为买办。1867年，按照惯例，他在担任买办之余，又和亲友投资公正轮船公司。当宝顺洋行停办后，他又由于在那里的工作经历，在1874年成为新创办的太古轮船公司总理——因为身为创办人之一的总船主麦奎因原是宝顺洋行的船主，他很欣赏郑观应。

在上海的长期工作，以及在赈灾过程中的表现，使郑观应开始与江浙士绅关系密切起来，甚至与名声甚好的经元善、谢家福^①等人结义为兄弟。在同宗——在淮系有相当地位的津海关道郑藻如^②的揄扬之下，郑观应还与淮系巨头李鸿章、盛宣怀发生了联系，尤其是盛宣怀几乎影响了他后半生的人生轨迹。

在盛宣怀的影响下，郑观应先后三次加入轮船招商局，其间还入主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也就是说，他和同乡亲友徐润、唐廷枢等人一样“洗白”了自己的身份，从一个买办转变为洋务企业的核心经理。洋务企业的管理者拥有亦官亦商的身份，这样的身份又转过来使得他拥有了更多的资源。

作为一个广东籍的名人，郑观应与很多广东人都发生过联系。后辈中更著名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作为晚辈同乡都曾和他发生过联系。他虽然不同意康、梁激进的变法措施，但还是给予了一定的帮助；而孙中山则是由他推荐给盛宣怀并转荐给李鸿章的^③。

当郑观应晚年想回广东养老时，却卷入了粤汉铁路风潮。最后离开广东而客死上海，可能也和这段经历有关。

2. 他和他的朋友们

当1858年来到上海的时候，郑观应只是一个在洋行工作的低级职

① 根据现存的谢家福所藏的兰谱，可以确定他们结义的时间是在光绪五年（1879年）农历六月左右。参见黄鸿山：《江浙洋务集团内部关系考——以谢家福所藏郑观应等人兰谱为中心》，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6（2）。

② 郑藻如，字玉轩，又字志翔，广东省香山县人。他于光绪四年（1878年）经李鸿章推荐担任津海关道——直隶总督的主要外交助手，光绪七年（1881年）后先后出使美国、秘鲁。与郑观应在上海“旦夕过从”的时间应是在他担任上海制造局会办的1878年。参见《香山县志·列传》卷11，19页，1924年刻印本，转引自武曦：《〈盛世危言〉的成书、增订及版本》，载《文献》，1980（2）。

③ 关于郑观应与孙中山的来往可参阅吴相湘：《孙逸仙近代思想与郑观应、容闳、严复、胡适之比较》，载《广东社会科学》，1996（6）；张苹、张磊：《郑观应与孙中山关系析论》，载《广东社会科学》，2003（3）。这些研究多少都有左袒孙中山的嫌疑，而且研究者没有说明孙中山在得到郑观应诚意的推荐后何以飘然而去，为何此后二人没有了任何来往。

员，与他来往的只有一些亲友。在这些亲友中，有几个人对他后来的职业生涯影响甚大。如徐润，作为他的表亲，不但给了郑观应很多经济上的支持，教会他商界的很多事宜，而且提携他进入了与其后半生几乎相伴的轮船招商局；如郑藻如，作为他的同宗，虽然在血缘上可能不是很近，但因为是同学并在上海再次相遇，加上两人有共同的兴趣，关系更为密切。

当郑观应成为太古轮船公司总理后，因为刊印了《易言》等书籍，参与了赈灾等公益性活动，获得一定的声望而逐步扩大了自己的交际圈子。在赈灾过程中他结识了一些江南的著名士绅，如经元善等人，进而与经元善、谢元福结为兄弟。这种交往无疑有助于提升他各方面的声望，无论是乐善好施还是博学多闻、精通洋务、心怀“大清”。个人以为，他第二、三本时事评论性的著作《易言》和《盛世危言》刊行后之所以能取得远比第一本《救时揭要》要大得多的影响，与经元善等人的揄扬有较大的关系。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没有任何功名的多少有“汉奸”之嫌的买办是很难得到士大夫们的认同，而经元善等人良好的名声，他们的认同有助于郑观应打开局面。从后来经元善在经、郑二人交恶后所说可看出，他们对郑观应相助确实多多。当然，在得到盛宣怀提携后，郑观应对经元善也多有关照。

如前文所述，郑观应除了结交经元善等人之外，还经过同宗郑藻如的介绍与淮系的“大佬”李鸿章以及淮系的“财神”盛宣怀发生了联系。从现有资料来看，尚不知初始见面时郑观应对盛宣怀的观感如何，但从日后的一些行为来看，盛宣怀无疑对郑观应的“知洋务”方面的能力，尤其是对企业的管理能力是非常欣赏的，他很快就通过各种方式（如薪酬、职务等）邀请郑观应离开太古轮船公司到他所控制的企业中任职。而郑观应在离开太古轮船公司之后的经历也几乎都和盛宣怀有关。郑观应先后应盛宣怀之邀在上海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任职，其能力也不负盛宣怀所望，每到一个企业都能有所成就，有所改革，多能在一定时间内使企业变得更有效率。二人在经营洋务企业中相得益彰，一个控制企业的大方向，一个负责具体的经营。郑观应也一直保持了对盛宣怀的忠诚，甚至不惜害了自己的结义兄弟经元善，使得后者戊戌维新后出逃到澳门时被捕。直到1902年，郑观应长期交往的王之春之邀到广西任职，出任左江道。这也是他唯一的一次正式出任官职。可惜王之春很快被弹劾，郑观应也被迫离职。这

段经历对郑、盛二人的关系损害很大。盛宣怀开始直接表达不满，不同意他离开轮船招商局，到郑观应离开广西后也只给了他一个小小的粤汉铁路广东购地局总办的职务。可能是之间的相互需要，不久之后二人关系有所恢复，这种交谊一直延续到盛宣怀离世。

二、郑观应和他的“道”

现在的中国近代史学界大抵把 1840 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自此以来的 170 余年的历史也基本上被认为有一条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向（无论是强调政治正确的革命史观还是看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开明的现代化史观，其实大体都认同这一点）：符合这条路向的就是进步的，不符合者则是逆潮流而动。郑观应则恰好在一段时间内处于时代的前沿（例如他主张立宪，主张设议院，而这一点中国近代一直没有成功，所以他就是先进的），因此在我们现在的思想史研究中他也占有了一席之地，甚至是重要的地位。

考察到目前为止的郑观应思想研究，我们会看到加诸他身上的诸如“伟大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实业家”等一大堆头衔，而对于研究的内容有时会不禁感慨一个人的思想居然可以如此细分数十块：经济思想、爱国思想、教育思想、国防思想、妇女思想、福利思想、吏治思想、外交思想、议会思想、科技思想、法律思想……观点和思想的混淆一至于斯。研究者中的严肃者也大抵谈论他的经济、政治方面的理念，对于他和同时代的思想者之间的承继关系以及他思想的核心却甚少涉及。

鄙意以为，郑观应似乎和陈炽等同时代的思想者一样希望富国强兵，他在经济方面的“商战”思想一时成了郑观应思想的代名词，他在政治方面主张“设议院”则成为他政治正确的重要注脚。与其他人相比，郑观应多了在外国企业（洋行）和国内企业（洋务企业）长期工作的经验。从这种经验出发，他对生产经营有了与他人不同的更为直观的见解，更重视企业在“全球化的时代”（虽然他自己没有用这个词）对国家经济和国民生活的重要性。这是他“商战”思想的由来。但无论是商战还是设议院，其实都是他的细枝末节——是“器”，而不是“道”。

在仔细翻阅郑观应的有关文献时，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只谈论他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而他的哲学观或者

说世界观却极少谈到，在不得已涉及时，也是《春秋》笔法，绝不直面评价。鄙意以为，至晚从19世纪70年代起，郑观应其实已然是一个道教徒^①，而早年的私塾教育则又使他在道家的养生思想中混杂了儒家的经世思想。

在《盛世危言后编》自序中，郑观应写到：

《危言后编》首卷言道术，即正心修身、穷理尽性，至命之学也。二卷至十五卷言道治，即齐家治国、安内攘外，自强之说也。而中外贤哲所论炼金神术、医学、地理之秘，有关于世道人心者，亦略采其要义，附以所闻。

如果说这段话多少有些含糊，没有直接表露他的道家思想，那么《盛世危言后编》中匡庐山观妙道人戴公复^②所做的序则更为直接地披露了郑观应的各种议论背后哲学层面的思想：

前著《盛世危言》，首篇论道器，盖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可变，而道不可变也。今著《危言后编》，首论道术，亦与前编所论道器同。惟世人只惜其前、后编所论中外利弊、富国强兵诸策法良意美，未见诸施行，而不知所论道器、道术，皆为修身之本，性命之学，即抱朴子所著内、外篇修己致人之意也。余恐解人难索，庸儒误以为异端，谨述先贤陆子潜虚之言以解之。……

或谓：“郑子所论中外利弊、富国强兵诸策，批郤导窾，目无全牛，实为用世之要务。若《道术》篇所论备言性命之学，修仙之法，近于遁世，与用世适立于反对地位，列为首篇，毋乃失其轻重？”岂知物有本末，修己方可治人，以道淑身者乃能以道淑世。济一子云：欲学神仙，先为君子。人道不修，仙道远矣。况观往籍所载神仙救人之事，指不胜数，盖神仙无不以积德立功为心，功满

① 郑观应在一篇文章中称自己“求道已五十年”，而且文中提到的“毒炸弹”、“飞行机”、“潜水艇”应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武器，故推断他是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修道，而有此思想则可能更早。参见《上张三丰祖师疏文》，见《郑观应》（下），47～48页。在另一文中，他自称“自幼好道，博览丹经，长复遍游海岳，备尝艰苦，获闻性、命双修大道”（《焚香祷告祖师师火龙真人疏文》，见《郑观应集》（下），70～71页）。

② 根据吴国富的考证，这位戴公复就是清末民初的著名画家戴振年，字公复，号白阳子，江西大庾人，曾在广东任过知县。参见吴国富：《郑观应学道经历探幽》，载《中国道教》。2012（3）。根据他的考证，我们可以知道《郑观应集》中收录的很多函件其实就是与戴公复个人的信件，而不是给其他人，如本卷中收录的《答戴君伯阳论道术书》。

即飞升蓬岛。能用世者多不能成仙，能成仙者类能用世。列《道术》为篇首，斯亦著述者以修身为本，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成己成人之意乎！

郑观应的这位道友明确地表述了郑观应的哲学思想——“以道淑世”。这篇序言无疑是经过郑观应本人审定的，由此也可以推断这种表述也代表了郑氏本人是认同这样一种理解的。

那么什么是道呢？除了在郑观应的通信中屡次表达的修身的“修仙之道”、“金丹之道”，还有很多关于道的论述，如“一语以包性命之原，通天人之故，道者是也”，“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为万世不易之大经。大本篇中所谓法可变而道不可变者”^①。到了晚年，他在论述教育的函件中表达更多的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认为这些才能“历千秋而不变，亘万古而常昭”^②。

在很多俨然以成为世界公民为荣的国人看来，郑观应的这些思想无疑是落后的、守旧的。可当我们回想欧美各国在各种场合强调“某某国精神”的同时，我们有些人却似乎已经找不到令自己自豪的“中国精神”。作为当时的弱国，中国若是没有这样一种精神支柱，似乎是难以令当时的郑观应们活下去并对国家、民族的未来抱有一丝希望的。从这一点来说，今天的我们似乎也不能苛责作为那个时代先锋的郑观应。

三、经济史上的郑观应

郑观应一生中经历的企业很多，早期是两个外国洋行（宝顺洋行、太古洋行），同时还依照惯例有了自己的企业（揽载行、和生祥茶栈），其间还在传统企业扬州宝记盐务当过总理，后来供职于上海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金州矿务局、开平矿务局、粤汉铁路等洋务企业。他在每个企业（除了三入三出的轮船招商局）待的时间都不长，有一些甚至只是盛宣怀给他车马费的借口，但对每一个企业，他都多少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能将企业建设好。

① 《盛世危言·道器》，见《郑观应集》（上），241页。

② 《答杨君昭伯、梁君敬若、何君闾樵书》，见《郑观应集》（下），251页。

关于他的企业管理，研究者多集中于他在轮船招商局的活动，为避免拾人牙慧，编者这里以他在汉阳铁厂的管理为例进行一点简单的说明。

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赫赫有名的汉阳铁厂其实自 1893 年投产以来亏累甚多，成了一个烫手山芋。最后，张之洞不得不在三年后的 1896 年将其转给盛宣怀承办，而代表盛宣怀出任总办、负责铁厂整顿的就是郑观应。

郑观应此前从未在重工业企业任职的经历，但上任伊始就看出了汉阳铁厂面临的几个核心问题：成本问题，销路问题，人才问题。半年后，他还提出了资金问题。在成本方面，他提出控制成本的核心是铁厂用于炼铁的焦炭成本过高——是外国焦炭价格的三四倍，为此要在萍乡自行炼制焦炭。在销路方面，他请盛宣怀出面控制筹建中的卢（沟桥）汉（口）铁路、粤汉铁路，以求铁轨由汉阳铁厂定造。在人才方面，他认为当时铁厂聘用的洋人不仅品格有问题，而且能力不高，需要重新聘用外国人才，并逐步通过新设的学习机器的书院培养本国的人才。在资金方面，他希望盛宣怀“揽办”银行，以解决这种重工业企业需要的长期巨额资金问题。

单纯从管理的角度看，郑观应的建议都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但作为清政府或者准确说是地方大员投资、控制的洋务企业并不能通过郑观应的实干解决问题，并“扭亏为盈”。郑观应自己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甚至担心张之洞对他“加以不测之祸，用泄其忿”。到了 1897 年 3 月就有人在上海日本人办的《苏报》上发文攻击郑观应。这次攻击的后果除了使郑观应身名受累之外，还引起了他和盛宣怀之间的误会。郑观应本人也于 4 个月后的 1897 年 7 月离职，回到上海轮船招商局。

从这段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有欧美痕迹的企业管理解决方案：成本问题方面，固然控制成本是中国传统企业也会去做的；在销路方面，他显然是想垄断经营；在人才问题上，他想通过职业技术学校（书院）来培养人才，显然不是传统的师徒制；在资金方面，他的办法是当时中国全新的银行投资模式。

四、“商战”——思想史上的郑观应

关于郑观应的思想研究非常多，甚至有学者将其思想划分为经济、